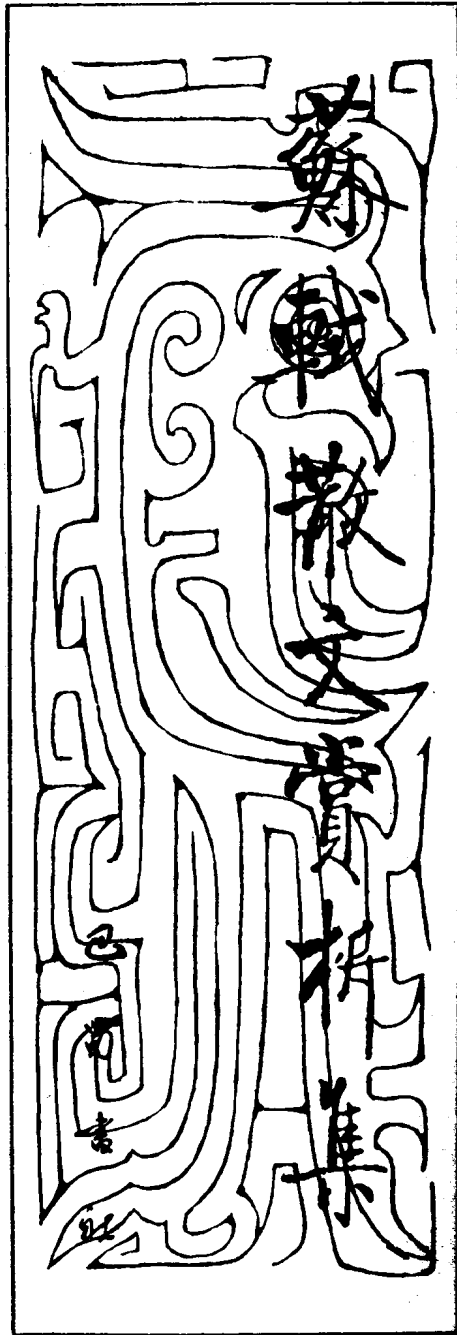


周先慎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蘇軾散文賞析集

周先慎 主編
巴蜀書社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侯跃生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苏轼散文赏析集

周先慎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1/32 印张10.75 插页 1 字数210千

1994年12月第一版

199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ISBN7-80523-639-9/I·253

定价：7.20元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

编辑缘起

我们伟大祖国向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历史悠久，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文学家、诗人、词人更是群星灿烂，名家辈出。为了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为了探索和总结古代作家的艺术经验，提供今人创作借鉴和参考，特别是为了在广大青年读者中普及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培养他们的高尚情操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以供广大青年读者学习、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各个集子均为作家作品赏析专集，精选作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内容、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加以赏析，使读者读此一集即可对该作家作品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和比较深入的了解。根据读者和作者建议，我们也适当编辑一些断代赏析集子，纳入本丛书之内，同时发行，以飨读者。

这套丛书力求知识准确，分析精辟，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各级各类大专院校文科教材、中小学语文课本所选篇目均尽量收入，故本丛书亦可供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小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以及广大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这套丛书以中国文学史为线，以诗词文为主，以唐宋作家作品为重点，兼顾其他各段作家作品，兼顾其他文学体裁。

为了保证丛书质量，特约请学界名流，对古典文学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和同志分别担任各个赏析集子的主编或撰稿人。赏析文章全部新撰，不收已发表于书刊上的旧作，以期尽可能达到目前最新最高水平。

这套丛书各赏析集主编，负责约稿、审稿、改稿和定稿工作。全套丛书均由巴蜀书社编辑部协助丛书编委会最后审定。这套丛书拟编五辑，每辑十种，由巴蜀书社负责陆续分辑出版，五年内出齐。

编辑作家作品的赏析专集丛书，尚属首创，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工作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古典文学赏析丛书》编辑委员会

巴 蜀 书 社 编 辑 部

一九八六年九月

前 言

苏轼是一个艺术全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杰出成就。就散文而言，不仅在宋代，就是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他都堪称为大家。他为我们留下的散文作品，数量可观、质量很高，对后世（尤其对明清两代）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轼在散文创作上继往开来，一方面继承优良传统，善于向前代散文家吸取营养；另一方面又善于熔铸和创新，以他辉煌的创作实绩最后完成了欧阳修所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在宋代建立了一种稳定而又平易流畅，便于抒情、言志、说理的散文体式与风格。苏轼喜读《庄子》，由于思想与个性的契合，在艺术上受庄子散文的影响很大，汪洋恣肆，开阖自如，富于艺术想象力。他善于学习《孟子》和《战国策》，纵横驰骋，雄辩滔滔。他的政论文还继承了贾谊与陆贽的传统，重实用而少空言，针对现实而发，有充实的思想内容。他推重韩愈，对韩愈有极高的评价，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将他的散文与杜甫的诗歌、颜鲁公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相提并论，赞誉其为极古今之变、毕天下之能事的“集大成”者（见《吴道子画后》）。但他对韩愈并不盲目崇拜，他是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扬弃其奇崛晦涩的一面，而发展其畅达淋漓的一

面。在宋代，苏轼师承其父苏洵和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得益颇多；但他并不是亦步亦趋，在效法他人中消融掉自己，而是吸取营养，化为自己的血肉，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发展和创造了一种纵横恣肆、挥洒自如的艺术风格。可以说，苏轼是继韩愈之后我国古典散文的又一位集大成者。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北宋古文运动的最后完成作出杰出的贡献，并对明清两代的散文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苏轼在写作诗词的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从事散文创作，终其一生，都以作文为乐事。他曾说：“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见何蘧《春渚纪闻》）但苏轼不是为作文而作文，他是有所为而发，或是情动于中而不得不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如“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南行前集叙》）苏轼的散文，是他的生活、思想、感情、性格的真实记录和表现；他平生不喜作应酬文字，不得不作时也常突破应酬文字常格，去掉一般浮虚溢美的习气，而能写出作者的真意和真情。

苏轼有着丰富曲折的生活经历，有着报国、事君、爱民的政治热情，有着渊博的学问和超卓的识见，有着横溢的才华和自由不羁的个性，所有这些综合融汇在一起，使他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杰出的成就。

苏轼散文的数量是十分惊人的，而且体式完备，几乎古典散文中的各种体裁都有传世作品。近年孔凡礼先生搜集整理、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搜集较完备，共六册七十三卷（底本为七十五卷，末二卷为词，未收），包括了赋、论、策、序、说、记、传、墓志、碑、铭、启、书、杂著、题跋、杂记等三十多

种品类。所有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大致区别为文学性散文和非文学性散文两类。文学性散文指叙事、写景、抒情散文，主要包括杂著、杂记、序跋、书札、小赋等。这一类作品艺术成就较高，最能体现苏轼散文的风格特色，自然率真，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这一类文章，略近于现代散文中的随笔小品，以抒写情志为主，间有叙事，题材范围极其广泛，几乎包括了生活中的一切重要方面：谈诗论文，品画评书，谈天说地，或与朋友叙友谊，或自述生活中的某种经历和体验，或记人，或记事，或记游，大到山川风物、民俗人情、古今事变，小至花鸟草虫、衣食住行、医药技艺，凡他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感，都可以极有兴味地信手拈来，写成文章。这种见真性情、出真境界，以自然天成作为特色的散文小品，对后世尤其是对明末小品文的影响极大，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非文学性散文主要指他的政论文和史论文。政论文包括他早年写的二十五篇《进策》和给皇帝的上书、奏议等，史论文包括他早年写的二十五篇《进论》，以及晚年所作并收入《东坡志林》中的一些史论。这类文章能见出作者政治家兼学者的思想和素养，充分地体现了他“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稼说》）和“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的写作特色。苏轼在《答俞括书》中曾说过：写议论文，当“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他以此勉励朋友，同时也作为自己在散文创作上毕生奋斗的目标。他的这类文章，无论是说古还是论今，多为针对现实而发，立论精辟，议论古今，俯仰千载，切中时弊。他的史论文论历史而有强烈的现实感，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当代实际，史论而兼有政论的色彩；他的政论文论时政而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联

系过去，印证现实，政论而兼有史论的特点。这类文章在写作艺术上主要表现为汪洋恣肆，纵横开阖，说理透辟，雄辩滔滔等特色。

二

范温云：“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潜溪诗眼》）苏轼作文，非常重视“立意”。他论吴道子画时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两句话移用来评论他自己的文章，也是非常恰当的。苏轼对“新意”、“妙理”的追求是很自觉的。他不止一次教导晚辈，作文必须“以意为主”，指出作文之用事（指选取材料），如人入市之购物，“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无法理解并运用材料）。此作文之要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因此，他的散文，不论是文学性或非文学性的，都十分讲究命意。文集中那些优秀的传世之作，总在思想上有所发明，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读后给人以启发，给人以新鲜感。

《文与可筧篔谷偃竹记》，是因睹物伤情，追念亡友而写，文章寄哀痛于戏笑之中，写得情辞真挚，十分感人。但文章的精警之处却并不在叙友情，而在论创作，叙事记人与谈论画意画法融合在一起。作者在他本人深厚的创作实践和艺术经验以及同画家文同相知极深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艺术创作问题的真知灼见：“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画竹不重在节节叶叶之形似，而重在求其气韵精神之神似，因此“数尺之竹”才能画出“万尺之势”。这一精辟的见解概括了艺术创作中的规律，给人以极大的启示。着意表现这一思想，并未因此冲淡了文章对作者与文同友情的叙写，恰恰相反，由于作者不仅得文同画竹之意，且得其

法，这就更足以表现他们友情之笃，相知之深。可以说，如果不是文章表现了这样新颖深刻的艺术见解，这篇以情动人的名作不会像现在这样令人难忘。

《书〈孟德传〉后》这篇仅三百多字的短文，在文“以意为主”这一点上，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以启发。苏辙的《孟德传》记叙了一个带有神奇色彩的逃卒，由于逃入深山，考虑到“擒亦死，无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死”，将生死置之度外，无所畏惧，因而多次遇到猛兽也毫无惧色，不为所动，结果反而使猛兽“逡巡弭耳而去”。苏轼在这篇跋文中，一连讲了三个小故事，都是见虎而不知是虎（醉人和夜归人）或不知虎会吃人（沙上小儿）反而使虎逃去的。这几件事原系民间传闻，孤立起来看本无多大意趣，大抵不过作为口传的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但苏轼将它们放到一起，用来说明一个道理，即：“人非有以胜虎，其气已盖之矣。”有了这一命意，三个本无深意的小故事便顿生光彩，有了灵魂。由于有了在思想上的提炼与升华，因而这篇跋文作为对子由原作的申发和补充，将一个看似超出常情、常理的事理，叙说阐发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文章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不畏虎就有可能战胜虎。由于作者在一些分散零碎的事例里，发现并挖掘出了蕴含于其中的生活的必然，并引导人们将不自觉变为自觉，这篇杂感式的题跋就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思想意义，不仅生动活泼，而且耐人寻味。

《又答王庠书》是一篇回答文学晚辈如何做学问的书信。信写得很恳切，内容很实在，介绍了自己读书中举的经历，概括了自己“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难能可贵的是，苏轼身处科举时代，本人又以科举进身而入仕途，后来还主持过礼部贡举，而在回答晚辈问题时，却不仅不以此炫耀，反而直截了当地指出科举

考试的不合理和弊端，并劝诫晚辈不以科举功名为念，而要切切实实地读书做学问，这实在是很有眼光和见解的。

其他如《石钟山记》、《李氏山房藏书记》、《日喻》、《书蒲永升画后》、《传神记》、《书吴道子画后》、《墨君堂记》等文，或寻幽探胜，或谈艺论文，或评议人物，或弘扬美德，或倡导学风，总是在作者深厚学养和丰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以立论超卓和见解深刻而博得历代读者的喜爱。苏轼的不少名篇，都大抵是同时以命意深刻新颖和艺术表现的精妙不凡取胜的。

不仅随兴而发、信笔挥洒的杂记随笔一类文学性散文重视命意，就是那些篇幅宏大的史论文和政论文，同样重视命意而以理论深度和逻辑力量见长。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作者考进士时的科场文章，虽然同所有科场文章一样，都是对儒家经典内容的发挥，但苏轼此文却并不是简单地代圣贤立言，而是一篇有思想、有见解、有激情的经邦济世的宏文。没有迂腐的教条气，而具有较强烈的现实感。

年轻时写的《进论》与《进策》，更是以古喻今或引古证今，有丰富的内容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进策》中的许多篇，对北宋当时所处的具体形势作了符合实际的中肯分析，既提出了总的方针，又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表现了一个年轻政治家审时度势的清醒头脑和敏锐眼光。例如在《教战守》一文中，作者引证历史经验，提倡居安思危，在承平时期必须重视加强战备，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之变。这确是切中当时政治要害的精辟见解。其他如《省费用》谈财政经济，主张节用廉取以理财，《决壅蔽》针砭官僚政治，提倡下情上达等，都是解决北宋政治弊端和社会危机的深刻见解。

在史论文中，他不为历史上公认的陈说所拘束，能拨开迷雾，大胆地提出新的见解，做翻案文章。例如《留侯论》一文，就揭开了圯上老人授书的神秘外衣，从社会人事一面进行分析，提出了政治上要有长远眼光，能“忍小忿而就大谋”，也是既新颖又深刻的见解。在《论周东迁》里，作者评史而具有现实眼光，立足于当代，有的放矢，阐明“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的道理。这在宋代北方异族侵扰、边防未安的条件下，真可说是震聋发聩之见，南宋时期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苏轼认识的正确和深刻。

三

单是命意好，还不能成为一篇精美的散文。苏轼的散文在重视立意的同时还非常重视艺术构思。苏文的构思特色可以用“奇”、“纵”两个字来概括。“奇”是别出奇想，不一般化；“纵”是能放能收，挥洒自如。这是与苏轼崇尚自然的文艺观分不开的。他曾自评其文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

苏轼散文的艺术构思，最能体现散文创作艺术中“工”与“易”的辩证关系。苏文中的优秀之作，艺术上都体现出一种以易为工的特色。追求自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既不强其行，亦不强其止，既不强其高，亦不强其低，这便是“易”；但自然成文，却又中规矩，合法度，并非随心所欲，漫无章法，这便是“工”。正如苏轼所说：“非能之为工，乃不能不之为工也。”（《南行前集叙》）这是顺乎自然、合于自然之

工，非刻意追求、人工斧凿之工，是以易为工之工。

《日喻》是一篇说理的文章。全文意在说明求道是不容易的，切忌主观性和片面性，强调求道的关键在于学，学即实践，“君子学以致其道”。表现了一种朴素唯物论的思想，认识相当深刻。然而设若不讲求构思，只是平平地将这一道理抽象地讲出来，则绝不会成为一篇精采动人的传世之作。作者以形象化的故事入题，设喻成篇，比喻的事与被比喻的理融合为一，非常自然，将深刻的道理讲得十分浅显生动，既具有吸引人的力量，又富有启发意义。我们读来，似乎觉得并不是作者为了向我们讲述某种道理在那里巧为设喻，倒像是作者跟读者一起从那生动的故事中共同悟出了深刻的道理。作者讲道理讲得一点不费力，读者接受这道理也一点不勉强。这便是以易为工的艺术构思所收到的积极效果。

与《日喻》相类似的还有一篇《稼说》。题中没有“喻”字，实际上同样是以喻入题，艺术构思体现了由浅入深、由具体而抽象的合乎人们认识规律的特点；题为《稼说》，却并非专论如何种庄稼，而是设喻成篇，重点在说明治学必须“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深刻道理。两篇都是设喻以言理，但《日喻》有辩驳，且将识日与求道融合起来，交互印证；而《稼说》则表现为层层递进，步步深入，由种地的稼和敛，说到人生的养和用，最后才论及治学之道，揭出文章的本旨。都是以浅喻深，以小见大，却又同中有异，在构思上不给人重复和雷同之感。

《放鹤亭记》是歌颂隐逸之乐的，表现了一种隐居之乐高于南面之君的超尘拔俗的思想。在苏轼那个时代、那样具体的生活环境中，这种思想自有它不能抹煞的积极意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构思，由堂而及亭，由亭而及山，由山而及鹤，再

由鹤写出那种“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傖东山而归”的超逸清旷、飘飘欲仙的思致，在这里，人（有隐逸思想的作者）与鹤（物化了的带仙气的人）融成了一体。既而又引出酒以作陪衬，末尾又结在鹤上以转入本题。整篇文章显得自由无拘，清远闲放，十分自然地表现了篇中所着力表现的那种“超然于尘垢之外”的气韵和意趣。

同为记体，《喜雨亭记》的构思则是另一种路数。首句即括出题中的“喜”、“雨”二字，通贯全篇。由古及今，由分而合，由实而虚，一反一正，情理相生，首尾呼应。文思曲折奇峭，但繁而不乱，奇巧中又见缜密，突破了一般记体文字的熟套。

苏轼散文专写人物的不多，但《方山子传》却是传世名篇。这篇人物传记在构思上很有特色，其基本出发点在略形而取神。全文仅数百字，假如详写传主陈慥家世，具体叙及他五十年中的种种经历，不仅会使文字冗长，而且很容易流于一般化。作者以简括的笔墨撮其大要，在介绍人物的一生“少时”如何、“稍壮”如何、“晚”又如何之后，点出方山子之得名；接着回忆自己在苏州和凤翔两次与方山子的交往和感受，着力挖掘和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风貌；最后以不求闻达和弃却富乐揭示出他的特异之处。全篇突出了人物游侠与隐沦两个方面。在短短的篇幅中，不仅人物的神气意态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而且人物的磊落豪迈之气和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情亦力透纸背。作者忠于自己对描写对象的体验和感受，努力寻找最足以真实地表现这种体验与感受的构思和表现形式，而不顾及、不拘泥、乃至有意地突破人物传记写作的常格。从这里，我们可以见出苏轼散文顺乎自然、以易为工的构思特色。

《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一文。构想最为奇崛不凡。但其基本特色仍是自由挥洒，“随物赋形”。文章是为勤上人的诗集写叙，勤上人自是一篇之主，但写法却是反主为宾。全篇以颂扬欧阳公为主体，而开篇却出人意料地拉出历史上一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人物翟公作陪，在对人的态度上以翟公的罪客，映衬欧公的罪己，得出欧公“贤于古人远矣”的结论；最后写出欧公非有德于勤上人者，而勤上人却涕泣不忘，足见其贤。仅寥寥数语，文章又结到勤上人上，喧宾并未夺主。文章落笔别出奇想，由古及今，由远及近，反主为宾，而又由宾而归到主，篇幅不长，却如龙蛇腾舞，变幻莫测；但全篇以表现人的贤与不贤为中心，贯穿首尾，又显得明畅自然，精细严谨。

这种既婉曲奇峭又不失自然的艺术构思，还见之于《上梅直讲书》。文章以自己读《诗》、《书》的感受入题，用周公、孔子的遭遇作对比，自然地引出对梅尧臣的敬慕赞颂之意，也是由古及今，由远及近。不同的是，此篇正面写对欧、梅二公的感激和敬仰，占全文篇幅的主体，而且写得激情奔放，有一泻千里之势，不像上一篇那样在文情两方面都显得比较节制和含蓄。

一些篇幅较长的议论文字，写来也不见板重凝滞，同样是自然灵动，不拘一套的。如《留侯论》，论人而不先从人说起，却是起笔凭空立论，笼罩全篇，有高屋建筑之势。而全文又“一意反复到底，中间生枝生叶，愈出愈奇”（《苏长公合作》卷六引钱文登语）。《贾谊论》则是开门见山，以议论带出人物，劈头一语论定，给人以简截明快、不容置疑之感，而中间正反错综，极纵荡变化之能事。《刑赏忠厚之至论》不仅思想上无科场文字气味，构思上也独出心裁，不受拘束。文章以引古咏叹的形式开篇，驾空行危，以无为有，皋陶之典，出诸杜撰；其间一意翻作

数段，用笔悠扬流美，圆畅自然。至于那些信手拈来、得自然之趣的随笔体短文（包括一部分书信题跋），则常是无头无尾，无始无终，意到笔随，意尽言止，无艰涩结撰之痕，有行云流水之妙，在艺术构思上几乎到了无迹可寻的境界。

四

文无定式，文无定格，这本是作文的一般规律。对苏轼来说，这又是他自由不拘的艺术个性的一种表现。他并不是按照各式文章的成格和成法来写作的，而是以能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心志和认识为出发点，让形式服从于内容，在表现手法上灵活多样，不拘一格。苏轼崇尚自然，无视种种人为的僵死的写作条规与程式。他不是“从心所欲不逾规”（这里的“规”是指文章的一定体式和作法，不是指作文的普遍规律），而是“从心所欲不见规”，但又是无规中有规，无法中见法。他的“规”和“法”就是：随意挥洒，意到笔随；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正如明人茅维所指出的：“盖长公之文，犹夫云霞在天、江河在地……若无意而意合，若无法而法随，其亢不迫，其隐无讳，淡而腴，浅而蓄，奇不诡于正，激不乖于和，虚者有实功，汎者有专诣。”（《宋苏文忠公全集叙》）

“记”这种文体发展到宋代常与议论相结合，在感性的叙述描写中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理性思考。这一特点在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作品中已经表现出来，而到苏轼则有了进一步的开拓和创造。他常将诗情和哲理结合起来，在记体散文中渗透进思辨的成分，表现出一种启人灵智的理趣。

前面曾提到过的《文与可筼筻谷偃竹记》是记叙与亡友的情谊的，充满真挚的感情，却同时又是一篇出色的画论。论叙相结

合，情理相渗透，他在论画意画法时实际上已经写了人，而在描写人物的精神风貌时，又因在不知不觉中使文同的画竹之法具象化，从而证实并深化了他所要阐发的绘画理论。

《凌虚台记》一篇因凌虚台而发出人生感叹，全文立意在于“物之兴废存毁，相寻于无穷”及“人事之得丧”，忽往忽来，不可得而知；从“凌虚”二字发挥，写得空灵缥缈。全文有景、有情、有理，是景、情、理三者的融合，写法是先记后议。《李氏山房藏书记》是应李常之约请而写的一篇藏书记，作意在从李君子匡庐的读书藏书，批评当时一些科举之士“束书不观”，劝人要认真读书，写法是先议后记。

《传神记》写法又不同。全文就顾恺之的传神理论进行发挥，阐述了一种颇有新意的审美见解，虽是重在说理，却又并未脱离记体的基本特点，没有流于抽象，而是有人有事，论中有记，以记为论。

《石氏画苑记》又另是一格。题为记画苑，实际重点却不是记画苑，而是写画苑的主人石幼安，“著其为人之大略”，写成了一篇栩栩如生的人物素描。作者不拘泥于文题，挥洒自如，写人物的个性修养、兴趣爱好、思想性格，总之是着重刻画他内在的思想精神。通篇是记，是叙述，结尾却引子由的一段话发表议论，得出“今幼安好画，乃其一病”的出人意料的结论，看似有悖于文题，实则从反面切中文题，写法本身就暗示出作者为什么不将画苑作为记述重点的原因。作者对好画藏画的看法借子由之语发之，不只是形式上以理作结，且理在记中，像灵魂一样贯穿全篇，读来使人感到别开生面，颇耐回味。

上列各篇在具体写法上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引议论入记，叙议结合，情理相生，既富于感情色彩，又别具